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資料选編

伯恩施坦言論

(供內部参考)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資料选編

伯 恩 施 坦 言 論

中共中央馬克思 恩格斯
列 寧 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資料室編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

伯恩施坦言论

中共中央馬克思 恩格斯
列 宁 斯大林 著作編譯局資料室編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陽門內大街 320 号)

新华书店(内部)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15\frac{3}{4}$ · 插頁 2 · 字數 378,000

1966 年 4 月第 1 版

196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統一書号 3002·131 定价(七) 2.00 元

印數 0.001—3,000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資料选編》

說 明

这套《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資料选編》是根据已收集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主要的老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著作編譯的。全套书按人分册出版，所收材料依写作或发表時間的先后順序排列，书后附有各人的簡要大事年表。

在每篇文章之前一般都加有編者按語和內容提要。按語扼要介紹文章的历史背景、基本論点以及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对这些机会主义論点的批判。內容提要基本上采用作者的原話，某些地方作了改写。

为了便于閱讀，正文中較重要的地方用黑体排印；原著的着重号，一律用黑点标出。

材料的选择和編譯如有不妥之处，希望讀者指正。

前 言

爱德华·伯恩施坦是第一个全面系统地“修正”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叛徒，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派的首领和主要代表。

伯恩施坦于一八五〇年出生在一个犹太血统的德国人家庭。父亲起初是白铁匠，后来做了火车司机。伯父阿隆·伯恩施坦是著名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柏林人民报》的创刊人。伯恩施坦从一八七一年到一八七八年一直在柏林一家银行里当职员。

伯恩施坦青年时期受到资产阶级反普鲁士君主专制运动的影响，具有一些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一八七二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他所以加入这个党，据他自己说，主要是由于对当时德国某些现状的不满和对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在普法战争中遭受迫害的同情。可见伯恩施坦是带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加入工人阶级政党的。在入党初期，他所了解和崇拜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拉萨尔和杜林的机会主义。

伯恩施坦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在入党以后一直没有得到改造，因此，他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入党以后的六十年中间，除了一八八一年至一八九〇年这短短几年在恩格斯的严格监督和帮助下，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主编，为党在宣传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外，其余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反党反马克思主义活动的。

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是经历了一个产生、形成、发展

和系統化的過程的。

他的機會主義思想的第一次大暴露是在德國統治階級實施《鎮壓社會民主黨企圖危害治安法令》（簡稱為《反社會黨人法》）的初期。

一八七八年，工人階級的死敵、德國反动透頂的“鐵血宰相”俾斯麥頒布了《反社會黨人法》。黨的大批黨員和組織遭到迫害，黨處於嚴重困難時期。這時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就大大活躍起來。盤踞在黨的領導機構中和國會黨團中的拉薩爾派分子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甚至通過了解散黨的決議，主張把黨改組成改良主義工人團體。黨的某些領導人也發生了動搖。伯恩施坦抓住這個時機，同鑽入黨內的異己分子赫希柏格、施拉姆在瑞士蘇黎世（因此這個機會主義集團被稱為“蘇黎世三人團”）發表了《德國社會主義運動的回顧》一文，公開提出了一個投降敵人的右傾機會主義綱領。

他們竭力否認階級鬥爭，反對無產階級革命。他們認為：絕對不應反對資產階級，而應服從資產階級的領導；社會民主黨不應該是片面的工人黨，而應該是“一切富有真正仁愛精神的人”的全面的黨；黨不應“走暴力的、流血的革命的道路”，而應該放棄“不適當的和過火的行為”，“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黨不應當把一代人所不能實現的最終目的放在主要地位，而應該用全部力量來實現一些微小的改良和補綴。

這個綱領是伯恩施坦修正主義的雛型，也是他的“運動就是一切，最終目的是微不足道的”這一臭名昭著的公式的最初版本。

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右傾機會主義逆流受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迎頭痛擊。他們在給倍倍爾等人寫的《通告信》中，揭露了三人團企圖篡奪黨報領導的陰謀，嚴厲譴責了伯恩施坦等人在紙上承認階級鬥爭，而實際上卻抹殺、沖淡和削弱階級鬥爭。指出在伯恩

施坦等人那里，“作为社会主义基础留下的就只是‘真正的博爱’和关于‘正义’的空話”，并且表示“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①《通告信》还对党的某些领导人在严重的阶级斗争面前的动摇态度进行了批评。伯恩施坦受到这次打击之后，他的反党气焰暂时收敛起来了。从一八八一年起，担任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主编。一八八八年，伯恩施坦随《社会民主党人报》迁往伦敦。此后，他长期在英国定居下来。正是在这个期间，他逐渐发展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在这个时候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垄断资产阶级政策的产物，也是长期以来欧洲各国，特别是德国机会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

巴黎公社以后，欧洲各国经历了一个“和平”发展时期。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由于帝国主义的收买，工人阶级中间形成了作为修正主义社会基础的工人贵族阶层。同时，由于资产阶级实行反革命的两手政策，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把利用资产阶级的法律进行合法活动变成盲目崇拜合法性，变成了合法主义。这样，各国的机会主义大为泛滥。英国的工联主义和费边主义，法国的可能主义，德国的拉萨尔主义、福尔马尔主义等广泛流行起来。这些机会主义思潮为修正主义的产生作了直接的准备。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实际上是这些机会主义思想的继续和发展。它适应了帝国主义在工人阶级中寻找代理人的迫切需要。

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已经战胜了工人运动中其他一切思想体系而取得了统治地位，成为无产阶级解放的强大的思想武器。于是，资产阶级的御用“学者”就一个一个地出来向马克思主义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188、189页。

举进攻。如新康德派提出了“回到康德去！”的口号，奥地利的经济学家柏姆-巴维克提出“边际效用”学说，德国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布伦坦诺、桑巴特、沃尔夫等人，相继发表了一系列的著作，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学说，在理论上给了伯恩斯坦很大的影响。

在党内，以福尔马尔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公开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的学说，声称要改变党的路线，嚣张一时，没有遭到应有的反击。所有这些都给伯恩斯坦攻击与篡改马克思主义造成了有利时机，并提供了理论的“根据”。

此外英国的“费边社”对伯恩斯坦也有重大的影响。“费边社”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集团，他们害怕革命，反对阶级斗争，仇视马克思主义，宣扬要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通过改良实行社会主义。伯恩斯坦在英国居住期间，同“费边社”的领袖臭味相投，非常接近，把他们当做自己的榜样。伯恩斯坦自己承认，他正是根据英国的社会经济情况和从“费边社”那里“学到了一些东西”，从而改变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看法。

由此可见，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只不过是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的思想、各种机会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学者”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拼凑起来的大杂烩，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道地地混在工人阶级内部的资产阶级思潮。连伯恩斯坦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他的话“大部分不过是重复别人说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修正主义“按其内容来说，并不需要什么发展和形成，它是直接从资产阶级刊物上搬到社会主义刊物上来的”。^①

从《反社会党人法》废除到恩格斯逝世之前这一时期，伯恩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19页。

坦虽然还不敢系统地散布他的修正主义，但在他发表的几篇文章中，一直在偷偷摸摸地贩卖他的修正主义的基本观点。在《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的作用》一文中，伯恩施坦声称，不能低估一百五十万张选票对“党的策略所具有的意义”，并进而断言，“走向完全政治自由的道路是通过议会制度，而不是绕过议会制度”。在《卡莱尔和英国的社会政治发展》一文中则更明确地提出，“社会革命不依赖暴力的袭击和流血的叛乱”。在另一些文章中，伯恩施坦竭力鼓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社会”，同资产阶级实行“妥协”和“联盟”等等。这些言论表明，在这一时期他的修正主义思想已经相当成熟了。

一八九五年，恩格斯逝世以后，伯恩施坦摆脱了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的监督，立即抓住这个时机，向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

在一八九六年即恩格斯逝世后的第二年，伯恩施坦为瑞士历史学家路易·赫尔梯尔的《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史》作评注并写了《法兰西共和国是怎样灭亡的》一文，借攻击布朗基是“恐怖主义者”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接着，从一八九六年十月起，在《新时代》杂志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公开宣布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要求“修正”马克思主义。这些文章发表后，立即遭到党内许多人的反对。伯恩施坦接连发表了两个为自己辩护的《声明》，全面地重申和补充了他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

在这些文章和声明中，伯恩施坦打着“反对教条主义”和“消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认为时代变了，资本主义变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已经“过时”了。他根据所谓“经济发展中的新材料”提出了这样一些“理论”：

一、到十九世纪末，资本主义和五十年前比较已经根本不同了。卡特尔、托拉斯等垄断组织的出现，使资本主义有了“适应能力”，经济危机已经可以防止甚至根本不会产生了。

二、社会主义可以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实现，“社会对经济生活的监督的扩展，市镇、县和省内的民主自治的建立以及这些团体的职能的扩大”，这一切都是“向社会主义的发展”，都是“社会主义一部分一部分的实现”，“伴随着这一发展，经济企业自然会从私人管理转入公共管理”。

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是更加激烈而是更加缓和了。一切先进国家的资产阶级的特权“正在一步步地向民主制度让步”，“政治制度愈是民主化，巨大的政治灾变（指暴力革命——编者）的必然性和机会就愈少”。

四、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学说已经“过时”，“在一百年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逼手段就可以实现了”。

五、由于上述政治和经济条件的成熟，“谈论（资本主义）社会长入社会主义，并不是错误的”。

六、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必须进行改良工作。在进行改良的时候，不问这些改良是否促使党“取得政权”，只问它们“是否有助于总的社会进步”，“细小的工作”“常常有最大的意义”。

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伯恩施坦得出结论说：

“我坦白说，我对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非常缺乏爱好和兴趣。这个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而所谓运动，就是指促进“社会进步”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这样，“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就成了风行一时的时髦口号，它“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①。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19页。

伯恩施坦的这个公式实际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公式。它的基本内容是：在政治方面，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通过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训练”他们“运用”资产阶级民主、议会的“合法手段”来“改造国家制度”。在经济方面，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通过“社会对经济生活的监督”、通过工人的经济组织、地方自治机构等的活动，逐步使资产阶级少数人的利益服从“公共利益”，使企业“从私人管理转入公共管理”。

总之，在伯恩施坦看来，工人阶级只要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进行一系列的“运动”，用不着暴力革命，用不着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用不着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资本主义就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伯恩施坦的文章发表以后，立刻引起了德国党内广大党员的不满。他们要求把伯恩施坦问题提到即将召开的党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讨论。但是由于党的领导人没有足够认识修正主义的本质和危险性，批判伯恩施坦的问题没有列入大会议程，只是在讨论策略问题时提了一下。倍倍尔等表示了反对伯恩施坦的立场，卢森堡、蔡特金等人针对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公式作了尖锐的批判。卢森堡针锋相对地指出，“夺取政权始终是最終目的，而最終目的始终是斗争的灵魂”，“最終目的对我们来说就是一切”。伯恩施坦的追随者奥艾尔、福尔马尔、海涅等人大喊大叫地支持伯恩施坦。考茨基采取了调和主义态度，竟说：“伯恩施坦没有使我们丧失信心，而是使我们思考，为此，我们应该感谢他”。

会后，考茨基和奥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维克多·阿德勒等写信给伯恩施坦，要他把他的观点系统地写成一本书。这样，一八九九年一月，《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这一臭名昭著的著作就出笼了。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的出版，说明马

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正是通过这一著作，伯恩斯坦全面地阐述了他的修正主义观点，使逐渐发展起来的修正主义思想系统化了。

伯恩斯坦的这本书，正如列宁指出，“成了马克思主义内部完全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的宣言”。^① 伯恩斯坦自己也认为，“整个说来，可以把本书看成德国社会民主党修正主义者的理论和政治倾向的说明”。

在这本书里，伯恩斯坦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全面系统地攻击和篡改马克思主义。而其攻击的主要锋芒则集中在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在哲学方面，他否定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以康德主义来代替唯物主义，攻击革命的辩证法，宣扬庸俗的“进化论”，反对“根据客观的历史必然性论证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并不”取决于“内在的经济必然性”，“给社会主义提供纯粹唯物主义的论证，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因此，必须“回到康德去！”。

伯恩斯坦攻击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致命之点”，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叛卖性因素，是妨碍对事物进行任何推理正确的考察的陷阱”，说马克思由于坚持辩证法而犯了“历史自我欺骗”的错误，“把一件需要几个世代才能实现的事，竟根据关于对立的发展和关于通过对立的发展的哲学而被看成一次政治革命的直接后果”。

由此可见，伯恩斯坦所以这样下死劲地攻击唯物主义辩证法，正是要制造反对马克思关于暴力革命学说的哲学基础，是要从根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3页。

本上推翻馬克思主義。

在政治經濟學方面，他反對馬克思的勞動價值學說，說“價值是純粹思維的構想”；他反對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學說，說這是“以假說為根據的公式”；他反對馬克思關於經濟危機的學說，說帝國主義階段經濟危機可以防止，甚至可以根本避免。他反對馬克思關於資本積累的學說，說什麼資本的集中、大生產排擠小生產的過程並沒有發生。他反對馬克思關於工人階級相對貧困化和絕對貧困化的學說。總之，他根本否定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一切基本原理。

伯恩施坦還說：必須預計到資本主義制度“有比過去所假定的更長的壽命和更強的彈性，並且按照這一預計來展開我們的鬥爭實踐”。他說這個思想是他的這部修正主義著作的“全部精髓所在”。

不难看出，伯恩施坦反對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的學說，其目的就是要掩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矛盾，否認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腐朽的、壽命不長的資本主義，否認資本主義的必然滅亡，充當帝國主義的忠實辯護士。

在政治方面，伯恩施坦在否定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基礎上，提出了一整套資本主義“和平轉變為社會主義”的綱領，說社會民主黨的全部活動就是“促進和保證現代社會制度在不發生痙攣性爆發的情況下轉移為一個更高級的社会制度”。

伯恩施坦誣蔑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學說是“布朗基主義”，說資本主義的“自由制度”是“有伸縮性的，有變化和发展能力的，用不着炸毀它們”。普選權是“使人民的代表從人民的主人轉變成為人民的真正仆人的工具”。無產階級專政是“屬於較低下的文化”，是“一種倒退，是政治上的返祖現象”。

伯恩施坦甚至還認為，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新階段”，連無產階

級的敵人資產階級也已經認識到，資本主義制度“並不是為了永恒而創造的，而是受變化規律支配的”，他們在賦予工人階級政治權利的問題上也在考慮避免發生“一場災變式的发展”。這實際上是在宣揚，資產階級的本性變了，反動階級是可以自動退出歷史舞台的。

伯恩施坦毫不掩飾地主張社會民主黨應該變成“改良的黨”，他說：如果社會民主黨有勇氣“願意表現為它今天實際上的那個樣子，即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改良政黨，那它的影响比今天更加大得多”。

伯恩施坦的這部修正主義著作受到資產階級陣營的熱烈歡迎。他們都為這個叛徒從馬克思主義者內部攻擊馬克思主義而歡呼稱快。例如德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卡爾·狄爾認為，伯恩施坦把“科學社會主義直到今天認為正確的一系列的學說駁倒了”。社會民主黨的死敵、德國國家社會主義的領袖弗里德里希·納烏曼說：“我感到高興，因為伯恩施坦繼續在黨的內部鼓吹：讓我們拋棄馬克思主義的已經過時和已經無效的公式吧！”他還把伯恩施坦稱為“我們在社会民主黨陣營的最前哨”。連伯恩施坦自己也無恥地宣稱，“本書在資產階級出版物中受到熱烈的歡迎，各式各樣的稱贊雪片似的飛來”，“我已被馬克思主義的敵人尊奉為馬克思主義的‘毀滅者’了”。

這本書出版以後，德國黨內以伯恩施坦為首的修正主義派最後形成了。在伯恩施坦修正主義影响下，修正主義也從個別國家的現象變成了國際現象。一八九九年六月，法蘭西的機會主義者米勒蘭參加了資產階級的反動政府，作出了“實踐的伯恩施坦主義的絕好的榜樣”。^① 俄國也出現了伯恩施坦主義的變種經濟主義和孟

① 《列寧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20頁。

什維主義。第二國際的各次代表大會上，馬克思主義同機會主義的鬥爭越來越尖銳。各國的機會主義分子“都成了一家弟兄，他們彼此稱贊，彼此學習，大家一起攻擊‘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①

伯恩施坦修正主義出現以後，德國社會民主黨接連召開了三次討論修正主義問題的代表大會。在這三次黨代表大會上，黨的左派同修正主義進行了激烈的鬥爭，通過了反對修正主義的決議。但是整個來說，鬥爭是不堅決不徹底的。特別是根本沒有提出同修正主義者組織上分裂的問題。

當時還披着馬克思主義者外衣的考茨基，在這場鬥爭中起了惡劣的作用。他一開始就採取了調和主義態度，掩蓋矛盾，抹殺分歧，保護和縱容修正主義分子，不主張把他開除出黨。考茨基的這種立場，在德國黨內有很大的影響。黨的最有威信的領導人倍倍爾曾堅決反對過修正主義，他在漢諾威和德累斯頓舉行的兩次黨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反對修正主義的演說，列寧給了很高的評價，說這是“在很長時期內成為捍衛馬克思主義觀點和為工人政黨的真正社會主義性質而鬥爭的典範”。^②但是由於他害怕分裂，總想“在黨的範圍內”解決分歧，在每次代表大會之後，無原則地強調黨的“統一”和“團結”。因此，他不可能把反對修正主義的鬥爭進行到底。盧森堡是黨內反對修正主義的最堅決的戰士，在反對伯恩施坦的鬥爭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恰恰在同修正主義實行分裂這個問題上，犯了嚴重的錯誤。列寧說過，德國左派“被考茨基的虛偽、學究氣、對機會主義的‘友好’這些卑鄙的東西四面八方包圍着”，他們“害怕分裂，害怕徹底說出革命的口號”。^③左派長期以來不敢單獨建立嚴格區別於機會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直到一九一八年

① 《列寧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18頁。

② 同上書，第19卷第295頁。

③ 同上，第312、313頁。

才从考茨基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内分裂出来，建立了德国共产党。但是已经太晚了。德国一九一八年的无产阶级革命，由于缺乏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被社会民主党的右派出卖了。这是一个极大的历史教训。

伟大的列宁则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同修正主义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就在伯恩斯坦出版该书的同年，列宁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等文，对伯恩斯坦主义及其在俄国的信徒进行了猛烈的反击。此后，列宁坚定不移地同修正主义展开了不调和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保卫了马克思主义，从而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伯恩斯坦公开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彻底背叛了无产阶级，堕落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列宁指出，社会沙文主义是机会主义的“继续和完成”，是“熟透了的机会主义，熟到这个脓疮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留在社会党的内部”。^①

世界大战刚一爆发，伯恩斯坦作为社会民主党的国会议员，在国会中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狂热地支持帝国主义战争。一九一五年一月伯恩斯坦写了题为《工人阶级国际与欧洲战争》的小册子，来为自己的叛变行径开脱罪责，同时还为其他国家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辩护，竭力否认第二国际的破产。此外，他不仅抹杀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而且公然为德国帝国主义涂脂擦粉，甚至无耻地给它出谋划策，要它设法骗取“工人国际的理解和赞许”。对伯恩斯坦的叛变言行，列宁给予了有力的批判。

当大战打了将近一年的时候，人民对战争的不满和憎恨愈来愈强烈，革命情绪日益增长，社会民主党的背叛愈来愈受到党内左派和革命群众的抵制和反对。伯恩斯坦为了阻止和缓和群众的革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20、289页。

命情緒，从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場轉到了社会和平主义立場即所謂中派立場。

一九一五年六月，伯恩施坦、考茨基、哈阿茲“嗅到群众在向左轉”^①便联合发表了一个呼吁书（《当务之急》），鼓吹“在自由协定的基础上”实现所謂“真正的持久的和平”。这个宣言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用“和平”的詞句来轉移群众的革命視綫，阻止群众采取革命行动。列宁指出：这“是一幕滑稽剧，它的作用是依靠向左鞠躬来挽救社会民主党中的腐朽的东西，依靠口头上向‘左派’作一些微小的让步，以便实际上巩固民族自由主义工人政策”。^②

在这个时期，伯恩施坦大力鼓吹和平主义还有一个原因是，他感到战争的发展对德国帝国主义并不十分有利，耽心德国遭受失败。他在一九一五年三、四月間曾写文章說，“战争已进行了八个月，虽然德国及其盟国的处境比它們的敌人要有利得多，但是整个說来，这种优势还没有象所期望的那样，大到德国将在短期內作为胜利者迫使別人接受和平条件的程度”。

从一九一六年下半年开始，各交战国已疲憊不堪，后备枯竭，人民的反战情緒和革命情緒比一年前又大大增长。这时世界政治中开始出現了由帝国主义战争向帝国主义和平的轉變，以便“和平地”分赃。一九一六年底，德国首相比特曼—霍尔維格在国会中提出准备开始和平談判。适应帝国主义的这种需要，伯恩施坦的活动又大大加强起来。

伯恩施坦在这个时期不止一次地在国会中鼓吹簽訂和約。一九一六年十月間，还带头发表过一个声明，劝告德帝国主义实行什么“民主的外交政策”，“实现国内民主作为和平的最好保证”等等。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63頁。

② 同上。